

睡獅將醒？： 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 「獅」意象*

楊瑞松**

從20世紀初期開始，以「睡獅」形容中國的文獻作品開始大量出現。本文針對睡獅這個國族符號相關意涵的課題，探索它在各種不同文本和歷史脈絡中的發展演變過程。我首先釐清並破除所謂拿破崙和此國族符號誕生之間的可能關係說法，再進一步確認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經過梁啟超的〈動物談〉中，以動物譬喻來論述國族的手法，藉由將「睡」與「獅」兩種負面意涵的結合（睡代表麻木不仁，獅則是老大腐朽的象徵），從而產生此項具有強烈負面意涵的國族符號。可是反諷的是，它的此種負面意涵卻在日後眾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94-2411-H-004-023)的成果。本文部分資料，運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開發之「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僅向金觀濤教授、劉青峰教授和魚宏亮博士致謝。本文初稿曾分別發表於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之「第四屆文化交流史：文化的衝擊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和政大文學院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的工作坊，會中承蒙講評人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黃克武教授，以及政大歷史系劉季倫教授提供寶貴意見；此外，兩位政大歷史學報的匿名審查委員也針對本文若干缺失，提出相當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僅在此一併向諸位先進致上誠摯謝意。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多引用的論述中高度淡化，它反而被詮釋成為漢族或中國國族之集體潛在力量的象徵符號；它甚至如同另一個國族符號「黃禍」一般，被視為是西方人（或是西方英雄人物）認為中國國族力量不容小覷而有感而發的恭維之詞。然而即使是如此，在近代中國的思想論述中，仍是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例如胡適的睡美人說，對於此盛行的睡獅國族符號的意涵和正當性，提出種種質疑或是再詮釋。本文藉由這些「異議份子」的觀點和意見，進一步檢視「睡獅」譬喻所代表的意涵的多重面相和其曖昧性，並且反思近代中國國族論述的特色和其可能的限制性。我希望能因此超越本質論式(essentialist)的文化現象分析，來理解這種百年來錯綜複雜的東西跨文化和跨語境的互動過程，以便能令我們能更進一步理解分析中西文化百年來交會的過程中，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價值的愛憎交雜之心態。

關鍵詞：睡獅，曾紀澤，梁啟超，動物談，胡適

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醒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¹

一個曾經使馬可·波羅驚嘆不已的東方大國，一個讓歐洲君主驚恐地虛構出「黃禍論」的龐大民族，也曾經令蓋世無雙的拿破崙警告西方不要去驚醒的一頭睡獅，為什麼會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呢？為什麼我們終於擺脫了亡國滅種的危機之後，忽然又覺得自己是非常強大的呢？²

“Napoleon said China is a sleeping lion, but I think now China is a lion awakening.”³

一、「睡獅西來說」？：拿破崙到底說了什麼？(或是他到底有沒有說？)

晚清時期是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論述的興盛時期。各類型具有歷史淵源或是想像性質的符號，諸如黃帝、病夫、黃禍等，均在各種國族想像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除了這些屬於人文社會範疇的符號之外，以動物譬喻作為共同體的代表符號，其中尤以睡獅的意象作為國族代表符號的使用，無疑是晚清以降相當具有特色的國族想像論述。⁴然而，所謂的「睡獅」符號，

¹ 鄒容，〈革命軍〉，收入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台北：經世書局，1981)，頁140。

² 蘇曉康、王魯湘，《河殤》(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88)，頁18。

³ 歐洲國會議長(European Parliament (EP) President) Josep Borrell在2006年7月5日接受媒體訪問時，對於中國的陳述。參見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xw/t261759.htm> 擷取時間：April 19, 2008.

⁴ 關於動物形象之於近代中國政治運動論述的研究，目前已有學者如Jeffrey Wasserstrom 和黃賢強的分析著作，然而他們側重的面相是各種不同的動物化圖像(如牛、豬、狼、虎)，在近代中國如何成為政治運動中的宣傳煽動工具，對於本文的研究焦點——獅是如何成為國族論述的過程和其多重意涵的課題，則並非他們研究的重點，參見黃賢強，〈動物化文圖與清末反教排外運動〉，《清華學報》，第28卷第4期(新竹，1998.12)，頁461-485；Jeffrey N. Wasserstrom, “Animal Imagery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Modern China,” *Excursions in Sinology* (Hong Kong: Shangwu Press, 2002, pp. 233-275)。和本文研究主題密切相關的研究則有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譯本，費約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

在近代中國國族論述當中，其形成的歷史過程和其曲折意涵，相對於上述的「黃帝」、「病夫」和「黃禍」形象，可謂具有更複雜的過程。⁵當我們仔細地分析探索和「睡獅」主題密切的各項相關議題後，我們將會發現，「睡獅」符號在近代中國國族論述的歷史建構過程中，所牽涉到之複雜的跨文化／跨語際，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想像比附的現象，相較於「病夫」或是「黃禍」，恐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而關於此課題的探討，也適足以反思歷史事實和公共記憶之間的落差和微妙關連性。

為何「睡獅」的形象，在近代中國國族論述的「自我言詮」中，會佔有如此鮮明的角色？如果從近年來，中外文引述此譬喻時的文本脈絡看來，此動物譬喻中所意涵的中國國族具有巨大潛能之意，無疑是它得以在近代中國獲得廣大迴響之主因之一。但更重要地，相傳「睡獅」說是出自於兩百年前法國皇帝拿破崙對中國的預言之說，可謂是「睡獅」說在近幾年來風行的決定因素。⁶80年代的《河殤》劇作旁白，和90年代的《中國何以說不》的大眾文宣作品，都引述了「拿破崙認為中國是睡獅」的說法，強調這是西方人（或者更精確地說，是西方史上數一數二的一位英雄豪傑）在由衷敬畏中國巨大潛力後，

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5)；以及“'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收入於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361-410。Fitzgerald的研究側重awakening在近代中國革命論述的寓意，對於「睡獅」作為國族象徵的分析則較少著墨。此外，單正平的〈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天津，2006.07)，頁29-36；及其專著《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13-145，雖然對於「獅子」象徵由來的歷史脈絡，提供若干洞見和文獻資料，但是對於其「西來說」的見解未有新的論述，此外他對此符號意涵所引發的正負反應，和在中西跨語際傳播交流上的複雜性的課題上，並未深入討論。本文將植基於這些研究成果上，針對相關議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⁵ 有關此三種國族符號的分析，可參閱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台北，1997.12)，頁1-77；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台北，2006.11)，頁65-108；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台北，2005.11)，頁1-44。

⁶ 有關拿破崙在近代中國的公共意識中，如何成為蓋世英雄形象的歷史形成過程之分析，可參閱陳建華，〈拿破崙與晚清「小說界革命」：從《泰西新史攬要》到《泰西歷史演義》〉，《漢學研究》，第23卷第2期(台北，2005.12)，頁321-354。

對中國所發的恭維之語。⁷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誠如在我先前有關「病夫」和「黃禍」的研究中所強調者，關於這些所謂「西方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意象的深入了解工作，不僅需要重新釐清這些符號在不同文本脈絡(textual)中的確切意義，同時也要深究，這些文本產生之歷史文化背景脈絡(historical-cultural context)。以「黃禍」、「病夫」為例，他們雖然均是源自西方，有關於東方和中國的公共論述，但是他們在不同的論述脈絡下，特別是在近代中國國族主義的論述下，其意涵往往發生不同的轉化，進而輾轉成為近代中國國族的重要符號。簡言之，這些源自西方的東方形象，在經過近代中國的思想界「自我東方化」的過程後，因而衍生出一種新的意涵。⁸以「睡獅」說而言，乍看之下，它似乎又是一個源自西方視野(拿破崙)的中國形象，轉變而為近代中國國族符號的另一事例。特別是近年來的中外論述(例如本文卷首的第2和第3條引文)，莫不強化此一意象。然而兩百年前的拿破崙真是如此敬畏中國嗎？事實上，在目前流傳的所謂拿破崙關於中國預言之說的各種英法語版本中——“Quand la Chines’ e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 (When China rises, the world will tremble)”，⁹或是“Behold the Chinese Empire. Let it sleep, for when this dragon wakes the world will tremble”，¹⁰還是“Napoleon said of China, ‘A giant is sleeping, do not wake

⁷ 《中國何以說不》的作者不僅以「18世紀，拿破崙曾說：中國是只『睡獅』，一旦醒來，將會震驚世界。一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世界驚呼：中國這頭『睡獅』真的醒來了！」的陳述作為其首編論述的開場白；並且以「猛醒的睡獅」作為此書的副標題。見張學禮，《中國何以說不——猛醒的睡獅》(北京：華齡出版社，1996)，頁4。此外，類似性質的著作如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的《中國可以說不》(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宋強，張藏藏，喬邊，湯正宇，古清生所著的《中國還是能說不》(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也都以巨大醒目的石獅像作為封面代表中國的意象。

⁸ 有關「自我東方化」現象的討論，參閱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in *History and Theory*, 35:4 (Dec. 1996), pp. 96-118.

⁹ Alain Peyrefitte, trans.Graham Webb, *The Chinese: Portrait of a Peopl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7)，卷頭語引言。

¹⁰ 見此版本於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p.5. Fitzgerald在此註明他無法找到確切的原始文獻出處，但此段話經常被當代著作引用，例如在 Richard Bernstein & Ross Munro,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Knopf,

him”，¹¹或者是“Let China sleep. When she awakens, the world will be sorry”¹²當中，我們均沒有發現有「獅」的意象。更進一步而言，近代西方的公共論述和文獻討論中，幾乎沒有運用「獅」的意象，形容中國或中國國族的情況。由此文獻證據的角度，所謂「睡獅西來說」的說法不免啓人疑竇。更令人訝異的是，John Fitzgerald 在經歷一番嚴格的文獻查證工作後，直接了當地斷言，所謂拿破崙對於中國沈睡的預言，根本沒有任何確切文獻證據的基礎，他認為此傳言乃是建立在謠言之上。¹³如果 Fitzgerald 此項論斷為真，那麼不僅「睡獅西來說」，其穿鑿附會性質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證明了重新檢視「睡獅」說的歷史發展脈絡的必要性。¹⁴這也正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之一。我將試圖釐清是那些歷史因素，促成了睡獅說在近代中國誕生、發展、和多重意義的演變。

此外，姑且不論「睡獅西來說」是否能夠成立，「睡獅說」明確地成為近代中國國族符號(起初帶有強烈的漢族中心色彩，之後演變為所謂中華民族的集體象徵)的時間點，從目前可掌握的文獻資料看來，應該是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的世紀之交期間。從 20 世紀初期開始，以「睡獅」形容中國的文獻作品開始大量出現。然而，此時期也是其他國族符號盛行時期，在閱讀相關的文獻過程中，我們也經常發現「睡獅」譬喻和其他的國族符號，例如「病夫」、「黃禍」、「黃帝」等，同時出現在同一個文本之中。這些符號的意涵之間有何互補或

1997).

¹¹ 見 *The Times* (London), 12 August 1936, pg. 15; Issue 47451; col C.

¹² 見 *Time*(時代雜誌)(New York), 1 December 1958, 封面右上角引文。

¹³ 見 Fitzgerald 的詳細說明於〈中文版序〉，《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頁 2-3；以及他所著之“‘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pp. 373-374.特別是在頁 374 的註 9 中，他詳細地描述他如何就教於相關研究學者，以及在英國的博物館和圖書館以「地毯式」的查證方式，均無法找到能支持拿破崙有關中國預言的英法文原始文獻證據。

¹⁴ 在本研究進行期間，我借助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的原始文獻資料庫，以關鍵字詞的方式檢索從 1750 到 1985 年間的全文查詢，結果只有在 1936 年的資料中，找到所謂拿破崙對於中國沈睡的說法。在整個 19 世紀的文獻資料中，並未有相關的任何發現。此項結果也可以佐證上述 Fitzgerald 的論斷。

強化，甚至是潛在的矛盾關係，也將是本研究的考查重點之一。

儘管睡獅譬喻，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廣為流傳，包括與其相對應而隨之而起的「醒獅」形象，也成為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國族符號；然而對於以「獅」作為國族集體想符號的適切性，其種種之負面意見，也是歷史上不容忽視的另一種聲音。因此在探討「睡獅」論歷史發展的研究過程中，我們也將藉由這些「異議份子」的觀點和意見，進一步檢視「睡獅」譬喻，所代表的意涵的多重面相及其曖昧性，並且反思近代中國國族論述的特色和其可能的限制性。

二、「睡」與「獅」的結合：睡獅在近代中國的誕生過程

誠如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所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近代論述中，尤其是在啓蒙運動和帝國主義影響下，形容一個民族或國家處於「睡夢」狀態，事實上是指稱其處於不理性的原始狀態。因而此種說法一方面強調西方近代文明(理性和清醒)的進步和優越性，同時也合理化西方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侵略行動。另一方面，由新教徒傳教的思想傳統言之，如何傳播福音，將處於「蒙昧」狀態的異教徒「喚醒」(awakening)，這種宗教思維和傳教活動，也是構成近代西方有關於「睡夢」的另一種重要論述。可是有趣的是，在近代中國思想界的改革和革命論述中，此種「睡夢」狀態的論述，不僅在後來轉為「中國乃是具有令西方人生畏的巨大潛力」的說法，進而成為國族論述中強化建構國族想像的重要因子；更以所謂「喚醒中國」作為改革和革命宣傳的主要信念，從而正當化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如孫中山以「喚起種族意識」達到排滿的民族革命訴求，而毛澤東則強調「喚起階級意識」的「人民革命」以真正打造一新的國家。¹⁵

就 19 世紀中國在西方的形象而言，所謂「停滯的文明」的見解，漸漸

¹⁵ 參閱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有關宗教面相的意義，見其“‘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

取代過往對於遠東大帝國的讚美推崇。在 19 世紀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其歷史哲學論述中，中國意味著是和西方進步的歷史發展，作為強烈對比的停滯文明。馬克斯更以木乃伊(mummy)的枯朽意象，定位中國文明如同一個老朽且不堪一擊的「活死人」。¹⁶特別是在清帝國暴露出，其無法抗拒來自西方的挑戰的弱勢後，所謂「老大帝國」的中國形象，更是流行於西方的知識界。比方說，著名的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在其 1861 年出版的 *The Chinese Classics* 即斷言：

China has increased beyond its ancient dimensions, while there has been no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of thought. Its body politic has the size of a giant, while it still retains the mind of a child. Its hoary age is in danger of becoming but senility.(中國已經擴張超越它古代的領域，然而思想上卻沒有相對應的進展。它具有巨人一般的政治軀體，但卻停留在兒童般的心智狀態。它的老邁年齡已使它陷入風燭殘年的險境。)¹⁷

不僅知識界如此，在一般的公共政治論述中，我們也可以見到更負面的形容用語。例如在 1858 年 *The Times* 的一篇評論文，即是以“sleeping monster”形容當時的清中國，¹⁸此外，在 1854 年 *The New York Times* 上一篇關於基督教傳播評論的文章中，語帶興奮地描述含有基督教色彩的太平軍革命如何改變中國：

China, the long sleeping, motionless China, has moved. A nation that has known no advancement for two thousand years past, has begun to advance.

The first want awakened by this great condition in China, was the profound, the earnest, and the ardent prayer of the whole Christian

¹⁶ 有關19世紀中，西方對於中國乃是「木乃伊」的思想文化論述脈絡的詳細分析，參閱Rolf J. Goebel “China as an Embalmed Mummy: Herder's Orientalist Poetics,” *South Atlantic Review* 60:1 (Jan. 1995), pp. 111-129.

¹⁷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 11.

¹⁸ 見*The Times* (London), 19 January 1858, pg. 8; Issue 22894; col C.

Church.

(「中國，這個長眠不動的中國，已經開始動起來了。一個在過去二千年停滯的國家已開始前進」

「在中國被如此巨大情境所喚醒的最初需求，乃是來自所有基督教會的最深誠真摯的祈禱」。)¹⁹

這些西方思想文化界，在對於 19 世紀中國的描述當中，“sleeping, motionless, hoary age, monster”等字眼的運用，清楚反應出當時西方知識界對於當時清中國的負面看法；“sleeping”或是“motionless”等形容詞的意涵，均反映了上述的「中國文明停滯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當 James Legge 提到中國是擁有龐大人口和土地資源的巨人(giant)之時，他的重點主要是要強調中國在精神智力上停滯發展的現象，從而凸顯清中國「身心發展失衡」的危險局面。此外，紐約時報上基督教會評論文的思維邏輯，也明顯地印證了上述 Fitzgerald 所提出的 sleeping 和 awakening 論述方式的宗教淵源。

(一)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與睡獅意象的濫觴

如果說上述這些 19 世紀西方對於中國的負面指稱，乃是強勢的西方論述，對於清中國的定位評價，那麼晚清的外交大臣曾紀澤，在 1887 年以英文發表之著名的「中國先睡後醒論」(“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專文，則可視為是針對這些論述的 counterdiscourse。在這篇以西方讀者為主要訴求，最初以英文發表的專文裡，²⁰曾紀澤巧妙運用西方宗教論述當中，所懷有的「喚醒睡夢中國」之意象聯想，並將之加以轉化，進而為中國的現狀和未來辯護。²¹他特別以「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的說法，企圖

¹⁹ 見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17 May 1854, p. 8.

²⁰ 原文收入於許政雄，《清末民權思想的發展與歧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155-164；中文的版本，見龍應台、朱維鈺編注，《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89-96。以下引文乃根據中文版本。

²¹ 此為John Fitzgerald的詮釋，見“‘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p. 378.

駁斥當時流行於西方，認為中國是即將毀滅之老邁帝國的說法(此點可謂針對上述 James Legge 的論斷而發)。值得注意的是，曾紀澤在此文中，是將國家以擬人化(「中國不過似人酣睡」)的方式論述，其並未使用任何動物符號(獅或龍)來形容中國。²²(雖然曾紀澤本身，並未直接參與睡獅國族符號的建構過程，但是從下文的分析可知，他卻意外地成為了此符號的「創始者」)。他以「緣中國之意，以為功業成就，無待圖維，故垂拱無為，默想熾昌之盛軌，因而沉酣入夢耳」之新解，來扭轉甚至挑戰當時西方的中國觀。然而，曾紀澤在進一步論述「醒後的中國」的對外態度時，卻是一再強調「愚以中國雖記其前之屢敗，決不願棄其和好之心。蓋中國不似他國，一受災害，始終切齒」的和平友好原則。再者，在本文中，曾紀澤沒有支字片語提及拿破崙，同時也沒有引用，任何曾經運用「睡獅」或是「沈睡」的意象，來形容中國的西方政治評論者。相對地，當時西方輿論對此文的回應中，也同樣未見有引述拿破崙的情況。而且，曾紀澤對於當時西方政治文化具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但卻並未援引所謂拿破崙的中國預言，用以跟他的「先睡後醒論」來作對比。因此，從曾文論述中的這項「空白」，以及同時代的評論文也未提到拿破崙的現象看來，²³上述 Fitzgerald 的論斷——拿破崙關於中國之預言，事實上是植基於謠言——應是具有相當的可信度。²⁴

²² 1862年10月17日，清朝政府批准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提，以三角形黃色龍旗作為水師船艦旗幟與中國官船旗號的方案，此後黃龍旗成為大清帝國的代表符號。因此，「龍」的形象因此正式成為當時清帝國／中國的代表符號，但是曾紀澤在此文中並無意以任何神話或真實動物來形容中國。

²³ 曾文發表後，引發西方輿論界熱烈討論，但在這些討論中，似乎也沒有引述所謂拿破崙的中國預言，來和其言論作對比。例如刊行於1886年年底泰晤士報一篇評論文“The Marquis Tseng's Farewell To Europe.” *The Times* (London), 29 December 1886, pg. 5; Issue 31955; col A. 作者顯然已預先得到即將公開刊行的曾紀澤文稿，即高度評價此文的論點和曾紀澤不卑不亢的態度，評論文中所引用和曾文對比的西方關於中國的觀點，均是強調中國為“decay, moribund”狀態的老大帝國的觀點。全文完全沒有提及拿破崙或和所謂他對中國預言相關的論點。有關曾文在西方輿論界所引起的迴響的詳細討論，請參閱李思涵，《曾紀澤的外交》(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頁271-284。

²⁴ 反諷的是，編注本文的當代學者在本文卷頭的評介短文中，卻是以「相傳拿破崙曾把中國譬作『睡獅』，說最好不要去驚擾它。可是英國還是帶頭攻擊這個老大帝國……」作為開場白，見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深切熟稔西方事務的曾紀澤，並未以動物形象，特別是「獅」的形象，來作為「先睡後醒」的中國符號，也可能是因為其深知當時西方公共論述中，各種動物譬喻和西方諸國的對應關係。眾所周知，當時世界的一等一強國——大英帝國——的代表動物符號之一正是獅子。獅子的形象，不僅出現在各類型英國王室的象徵符號和軍事標誌上，更是當時公共論述和漫畫中，作為英國的代表符號(參見附圖)。在曾紀澤自己的論著裡，也曾清楚地描述在西方政治文化當中，動物和國家的對應關係。提及「英吉利國稱雄泰西，軍國大纛及宮廷印章，皆雕繪獅子與一角馬為飾，殆與俄羅(斯)畫北極之熊，佛朗西、日爾曼畫鷹隼者，各有取義……法尙蒼鷹俄白雄，英蘭旌旗繪黃獅。²⁵」由此觀之，倘若曾紀澤以「獅」作為中國的象徵，來作為論述中國「先睡後醒」的過程，必然會令西方的讀者感到相當錯愕。

曾紀澤此文發表的時間點也頗值得玩味。雖然當代學界，往往因為甲午戰爭結果的影響，相當貶抑 19 世紀下半期清中國改革運動的成效。然而，在甲午戰爭之前清廷本身的自我認知，以及多數西方輿情對清的改革評價，卻和上述的當代論斷大異其趣。²⁶無論是在外交事務上，或是西方技術和知識的引進上，清中國在 19 世紀下半葉，俱已達到相當的成效。雖然清中國的國力還不能和西方列強並駕齊驅，但是以清當時的改革氣象和外交談判上的若干成就，卻也足以讓曾紀澤能理直氣壯的宣稱清中國已不再酣睡，並且意欲直追西方諸國和其平起平坐。而且從當時西方輿論對於曾紀澤的說法，不僅沒有加以揶揄嘲諷，反而給予相當程度的重視和肯定的反應看來，曾紀澤「先睡後醒之中國」的比喻說法，一方面先巧妙地順應當時已風行於西方輿論界，所謂“sleeping China”的說法，但是卻提出一種新的詮釋，將其負面

龍應台、朱維鈺編著，《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頁89。

²⁵ 語見曾紀澤，〈為潘伯寅大司空畫獅子紈扇率題一首〉，《曾紀澤遺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頁315-316。

²⁶ 有關當代學界對於清中國19世紀下半葉改革的評價的可能盲點的討論，參閱Benjamin A. Elman, "Naval Warfare and the Refraction of Qing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 Reforms into Failure," *Modern Asian Studies*, 38 (Fall 2003), pp. 283-326.

意涵淡化；並且也沒有洋洋得意地自我言詮，以為清中國將是「甦醒的巨人」，而欲引發西方世界的恐慌反應。

(二) 梁啟超的〈動物談〉與「睡獅」意象的誕生

雖然曾紀澤的文章在西方輿論界引起廣大的正面評價，然而曾紀澤本人在此文發表不久後(1890年)於北京逝世，許多西方評論均認為這是中國政治人才的一大損失。²⁷而且清帝國的日後發展，並未如其文章所預言的，成為和西方諸國平起平坐的「已醒之中國」。步入19世紀末期的清中國，不僅未能「先睡後醒」，反而在甲午戰爭後，被西方公共論述視為新的「東方病夫」。各種中外的公共輿論，大多認定清政府已陷入「病老垂死」之境，若無大規模的徹底變革，難保中國將淪為東西列強瓜分之命運。這種具有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意識，充斥在各類型的議論中，特別是在所謂「百日維新」運動失敗後，更可謂是世紀末中國各類改革論述的共同基調。

上述的思想文化背景，正是梁啟超在1899年於《清議報》上發表〈動物談〉一文的重要歷史脈絡。梁氏在此文章中，藉由解釋其文中所言談的「機械怪物」(名為佛蘭金仙)，首次明確地將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之論，「加工轉化」成為「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²⁸當代學者雖已留意到，梁氏在此文章中將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和獅的意象結合，²⁹但卻忽略了分析梁氏在此所謂「動物談」的文章，如何以四種動物譬喻，來代表他所定位的中國現況。換言之，梁氏的「獅子」意象，不僅要從他如何結合曾紀澤的論述來加以了解，也必需從梁氏的文本脈

²⁷ 在《泰晤士報》關於曾紀澤死訊的評論報導中，不僅尊崇曾為遠古聖人曾子的後代，更視其殞落嚴重削弱了中國的改革力量，見“Death Of The Marquis Tseng” *The Times*(London), 14 April 1890, pg. 8; Issue 32985; col A.

²⁸ 梁啟超，〈動物談〉，收入沈雲龍主編，《清議報全編》，第4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頁75。

²⁹ 可參見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天津，2006.07)，頁31；以及其專著《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頁126-127。

絡中，根據他如何論述其他三種動物，方能深入了解其全文的寓意。

以寫作技法而言，梁啟超在此篇文章中以所謂：「哀時客隱几而臥，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爲開場白，文末又以「惜哉！哀時客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作爲結語的筆法，實可視爲梁氏一方面，安排「自我」（哀時客）在睡夢中（隱几而臥），如何因爲「他者」（the other，即甲乙丙丁四人者）對於中國的論述，來激勵「四萬萬人」同胞覺醒。由此觀之，甲乙丙丁四人者所言及的動物（巨鯨、盲魚、羊群、睡獅）的特色，實爲梁氏心中對於當時中國現況的界定——麻木不仁的巨鯨，代表著中國遭受「旦旦伐之」，卻茫然不知死期將至；久居昏暗之地的魚，視力退化（應驗達爾文的學說）後，如今環境丕變，喪失生存競爭能力而將滅種；面對現代屠宰技術，但毫無緊覺地步入死亡陷阱的羊群；號稱先睡後醒的機器獅，卻是「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銹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³⁰

在梁啟超的論述中，不論是巨鯨、盲魚或是羊群，都難逃即將死亡滅絕的命運，而即使是所謂由曾紀澤譯名爲「先睡後醒之獅」的機器怪物，也早已老朽不堪一試，若非經過一番徹底革新（非更易新機），亦難逃長眠之命運。整體而言，不管這些動物原本是否具有相當充足的資質或潛能，他們都已經喪失了面對當前環境競爭的生存挑戰能力。從比較觀點而言，曾紀澤在 1877 年時所撰寫的文章，是以審慎樂觀且不卑不亢的語調，企圖影響說服廣大的西方讀者，能夠以新的方式來理解並平等對待「已經甦醒過來」的中國；相對地，梁氏在 1899 年流亡避難於日本時完成的〈動物談〉，則是在強烈的亡國亡種的危機意識下，以極度自責悲痛的語調描寫末世紀的中國，幾乎已經到了瀕臨生死存亡之際，希望喚醒當時的四萬萬同胞，能夠成爲支持改革的新動力。所以從文本自身和歷史情境的雙種脈絡下而言，梁氏筆下作爲代表中國的「睡獅」，和其他三種動物一樣，均是非常「負面」的國族符號，用

³⁰ 詳見梁啟超，〈動物談〉，《清議報全編》，第4卷，頁75-76。

來激發號召中國讀者的危機意識，進而從事改革。事實上，梁啟超筆下的「睡獅」雖然明顯地比附曾紀澤的論點，但其意涵卻更貼近於，曾紀澤所欲扭轉駁斥的西方對於中國形象的論述。不論是前述 James Legge 在 1861 年對中國是「步入險境之老大帝國」的論斷，或是所謂“sleeping monster”的說法，都和梁啟超在世紀末之時，以「睡獅」等動物所譬喻的中國意象，有著幾乎一模一樣的負面形象。換言之，「睡獅」在此文的符號作用和意義(symbolic meaning & function)，和當代的許多論述當中，以「睡獅」(如《河殤》、《中國何以說不》)形象，來證明中國具有令人(尤其是西方人)畏懼之巨大潛能的說法，基本是大異其趣的。簡言之，現今所流行之「睡獅」論，和百年前由梁啟超所催生的「睡獅」，雖然表面上都是同一個「能指」(signifier)，但是其所對應的「所指」(signified)卻是不相同的。³¹

(三)睡獅論述的多重表述

從目前能夠掌握的文獻資料看來，「睡獅」論在近代中國的誕生，可能

³¹ 梁氏將曾紀澤有關中國「先睡後醒」的說法，轉化為「睡獅」的具體意象，也可能影響了日本公共論述關於此意象的認知。在日本著名期刊《太陽》的1900年出版的第6卷第8號的臨時增刊中，有一篇介紹各國局勢的文章〈第一部 東大陸諸國〉，作者在論述清帝國在19世紀已淪為腐敗之情況時，特別提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但卻指出曾氏不過是代表少數有數之士，清帝國舉國上下依然還是在睡夢之中。在此文中，作者並沒有運用「睡獅」的字眼。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一篇是為「論支那局事」的演講中，則明言：「曾紀澤謂今日中國猶獅，列國識者以為知言。竊謂支那猶難謀也。甲午一役，敗於我國黔驢之技畢露。」，見大隈重信的演講時間應當在1900-1901年間，中文譯文收入於1901年6月7日出刊之《清議報》，見《清議報全編》，第18卷，頁112。此外，原刊於明治39年(1906年)2月12日之《東京日日新聞報》的〈論歐美之對待中國〉一文中，也有如下的陳述：「中國公使曾侍郎紀澤，所謂中國乃一睡獅，其醒不易，一旦醒覺，必驚四鄰之言」，中譯本見《外交報彙編》，第4冊，頁410。有趣的是，另一篇發表於明治38年(1905年)11月2日《東京日日新聞》的〈論中國外交本原〉一文中則有以下之陳述：「其(中國)近世一大外交家，為世界所尊崇之曾惠敏公。距今十數年前，嘗以其國紹介於列強，其著名之策論，有曰中國者睡獅也。蓋本意即臥龍二字，而訛譯為睡獅。」，中譯本見《外交報彙編》，第4冊，頁261。由於大隈重信和梁啟超熟識，而他的文章發表時間在1901年左右，因此他所援引的曾氏睡獅說，有可能是源自梁啟超的說法，但這項推測仍有待進一步探討確認。而其他日本論述對曾氏睡獅說的眾說紛紜現象，也不啻反應出了此睡獅說的流傳過程中的種種加工的斧鑿痕跡。

正是梁啟超「加工」、「轉化」曾紀澤的論點，再融合其自身對當時中國處境的見解而成。從 20 世紀開始，此符號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界，漸漸成為流行的國族符號。然而它的意涵，也隨著各式各樣言說者的論述策略而變。在最廣義的用法下，它可能是較為單純地代表清中國或是日後的共和中國，延續著曾紀澤和梁啟超的基本關懷，強調中國在新的列國競爭局面下的劣勢處境。例如在 1903 年發表於《江蘇》，一篇題為〈今世界之頑物〉的時論，即以類似〈動物談〉的沈痛諷刺的方式，論說「全世界之中有至奇極怪不可思議之一物。其四支百骸則儼然人也，聲音笑貌則儼然人也，食息動作亦儼然人也；而無骨無血無腦筋無感覺。……或字之曰睡獅。近世生物學者出，研究其性質，檢驗其能力，知其疲軟脆弱非獅類，曰是今世界之頑物不足懼，其肉可食，血可飲，皮可衣。……諸國轉瞬而逐此頑物者，將踵錯於大陸焚巢搗窟而無復子遺。³²」作者在此文中，雖然也先以「睡獅」譬喻中國，但又藉現代科學的論斷(近世生物學者)，將所謂「睡獅」的「獅」性否定掉，並預言其「頑物」將滅絕於西方人之手上，這樣的論述手法可謂和梁啟超在〈動物談〉的論述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在晚清時期，相對於這種以現代國際關係的論述架構，用「睡獅」代表中國的論述，「睡獅」的另一種可謂是「本土化」的意涵，則是被挪用為代表漢族的集體符號，以強化滿漢之間的「主奴」壓迫關係。如同當時盛行的「黃帝」符號，「睡獅」成為當時許多革命文宣中，建構漢人意識的重要象徵符號。例如本文卷首所述，鄒容之《革命軍》以及陳天華的《猛回頭》(「那怕他，專制政，層層束縛；那怕他，天羅網，處處高張。猛睡獅，夢中醒，向天一吼；百獸驚，龍蛇走，魑魅逃藏。³³」)均是以「睡獅」的意象，代表所有漢人長期處在專制統治，並藉此鼓舞漢人起而推翻清朝專制政府。在 1904 年間刊行於《江蘇》的〈招國魂文〉，則是在文章的開端直陳「嗚呼，自明崇禎帝殉國後之是年十月一日，是實我國國亡魂散之日也，自是以後，如巨獅酣睡，沈沈

³² 〈今世界之頑物〉，《江蘇》，第5期(東京，1903.08)，頁83。

³³ 陳天華，《猛回頭》，收入於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頁171。

不醒者垂二百六十年」，³⁴這種論調可以說完全以「反清復明」的傳統論述，來界定「睡獅」的意涵。³⁵另一篇刊行於 1906 年的評擊專制政體的文章，則痛陳：「大好神明子孫四百兆同胞性命，一任專制君主蠻夷酋長，吮其精血，攘其權利，賣其土地，盡數將我國民綁入法場，而我國民真如所謂袖手以作壁上觀，而縛以待死期之至，而毫無抵抗力也，此千年之睡獅乎？」³⁶

另一方面，隨著「黃白種戰」意識和黃禍論在晚清中國的流傳，³⁷特別是在日俄戰爭後，「睡獅」儼然成為「黃禍」的另一個較隱性的代名詞。上述反滿的論述中，往往強調「睡獅」之所以「沈睡」，乃是被異族奴役的結果；但是和「黃禍論」相提並論的「睡獅論」，則往往側重「獅」所具有的(潛在)威嚇力量。這種以「黃種 vs. 白種」為基調的「睡獅」的論述，可以見諸於 1903 年發表之〈教育通論·緒論〉一文。作者先以長篇大論，強調今日世界乃是黃白種之間對決的局面，而中國為黃種之最重要代表，所以必須以新教育改革中國，在結論中有以下的陳述：「哀哉，吾祖國而成為無教育之國也。夫欲以無教育之國頓為有教育之國。斷非一蹴所能幾。雖然，需者事之賊。當危急存亡之秋，而不以全國之精力，養成今日切用之人才，不能生存於競爭激烈之世界。睡獅睡獅不醒則已，一醒必使之驚人，其必以斬釘截鐵之手段，運臥薪嘗膽之精神而後可也。」³⁸

在另外一篇發表於 1904 年，有關留學生的評論文章當中，作者認為「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國為旨也，數十年前德相俾士麥已有毋醒東方睡獅之言，瓜分中國之議亦首唱之。[德]而德皇威廉又心醉黃禍之說者也。故其於中國之

³⁴ 海上觀潮老生，〈招國魂文〉，《江蘇》，第9、第10期合定本(東京，1904.03)，頁255。

³⁵ 此類以反滿來強化漢人意識的「睡獅」論之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刊於1901年《國民報》的〈社說〉在「說漢種」一單元中，一再強調漢人淪為滿人之奴，漢土為滿人侵佔的局面，導致近日漢人又被西方人所欺壓的下場，因而感歎漢種「傾覆之危，在於瞬息，睡獅睡獅曷其甦焉！」，見《國民報》(東京，1901.07)，頁17。

³⁶ 吳魂，〈中國尊君之謬想〉，《復報》，收入於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頁543。

³⁷ 有關此課題的探討，參閱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頁65-108。

³⁸ 見雲窩，〈教育通論·緒論〉，《江蘇》，第3期(東京，1903.06)，頁46。

腐敗也則幸之，於中國之革新也則阻之。³⁹」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作者除了將「黃禍」和「睡獅」，分別視為一種對西方人具有威脅力量的顯相和隱相，並且似乎認定「毋醒睡獅」之論，乃是來自德國首相俾士麥。有趣的是，這樣的論述模式，在表面上和近年來流行的「拿破崙說獅論」雖不盡相同：(1) 俾士麥≠拿破崙；(2) 現代睡獅論述中，不一定和「黃禍」相提並論；可是就其基本思維模式而言，這兩類有關「睡獅」的說法，可謂具有相同的本質：(1) 同樣以一位著名的西方政治人物(西方政治權威人物)，發出不要驚動睡獅(中國)的警語；(2) 同時也認定「甦醒後」之中國，必定具有威脅甚至攻擊西方的能力；(3) 中西之間的關係，基本是彼此激烈的鬥爭競存關係，因此「睡獅」中的「獅」所具有的威脅潛力，乃是「睡獅」的核心意涵。

如果說當代流行的拿破崙之睡獅論，真的是一項穿鑿附會的說法，而且到目前為止，也無從查證它的確切可能出處，那麼或許上述的例子，提供探究此說法的一條可能線索。換言之，這種強調「睡獅」論乃出自一位西方的權威政治人物，基於他對於中國潛力的洞見，因此以百獸之王(獅子)的譬喻，形容中國所具有的力量，進而對於世人(特別是西方人本身)發出警語的論述模式雛型，已經在 20 世紀初近代中國的公共論述中出現。此論說的構成，一方面有來自 19 世紀期間中西論述裡，有關“sleeping China”的因素，特別是梁啟超所描繪的具體「睡獅」形象；另一方面則結合 19 世紀末源自西方的「黃禍論」，強調黃種人的潛在威脅勢力。如此一來，使得 sleeping China 和梁啟超筆下的睡獅，原先是意味老大中國即將滅亡(長眠不起)的寓意，反而轉而為一種代表具有巨大潛力的中國即將甦醒的前兆之符號。例如麥孟華於 1900 年發表在《清議報》的〈論救亡當立新國〉一文中，即以清廷若能實行新政，則列強萬國「莫不謂國政既修，國勢必奮。百年之睡獅已醒，泰東之病夫將愈，我四萬萬之國民，將可振袂迴旋於二十世紀之舞臺矣。⁴⁰」的論述，強調上述清中國具有回復其潛在國力，進而和列強相爭的可能性。

³⁹ 〈德人干涉留學生〉，《江蘇》，第9、第10期合訂本(東京，1904.03)，頁275。

⁴⁰ 麥孟華，〈論救亡當立新國〉，收入《清議報全編》，第3卷，頁113。

雖然上述強調「睡獅」具有的潛在力量的論述，可謂形成一股近代中國關於「睡獅」的主流詮釋，甚至時至今日可謂成為唯一的詮釋。⁴¹然而，對於這樣的詮釋，並非沒有出現不同的聲音。這些不同的意見，或許早已被認為是已然甦醒的獅子之「獅子吼」所淹沒。但是他們作為一種 counterdiscourse，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加以質疑批判「睡獅將醒」之論述的適切性；甚至企圖以其他的符號，來替代而轉化其意涵。我們將在下一節中，分析這些「異議份子」，如何對「睡獅」的符號意義加以反省批判。希望藉由此項分析，進一步了解「睡獅」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多種象徵意義，以及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是如何反思(暴)力的文化意涵。

三、Beauty or Beast？：「睡獅」意涵的再商榷

(一)睡美人或睡獅？

「拿破崙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余以為以睡獅喻吾國，不如以『睡美人』比之切也。歐洲古代神話(The Sleeping Beauty)相傳有國君女，具絕代姿，一日觸神巫之怒，巫以術幽之塔上，令長睡百年。以刺薔薇鎖塔，人無敢入者。百年期滿，有武士犯刺薔薇而入，得睡美人一吻而醒，遂為夫婦。英詩人鄧耐生咏其事。其詩往往微合吾國近世史事。感此作睡美人歌，以祝吾祖國之前途。」

「東方絕代姿，百年久濃睡。一朝西風起，穿幃侵玉臂，碧海揚洪波，紅樓醒佳麗。昔年時世裝，長袖高螺髻，可憐夢回日，一一與世戾。畫眉異淺深，出門受訕刺，殷勤遺群侍，買珠入城市。東市異宮衣，西市問新制，歸來奉佳人，百倍舊姝媚。裝成齊起舞，主君壽百歲。⁴²」

⁴¹ 有關20世紀初，各類強調中國已是或將是「醒獅」的論述評介，可參閱單正平的〈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天津，2006.07)，頁29-36；及其專著《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13-145。

⁴² 胡適，〈藏暉室札記〉，《新青年》，第4卷第2期(上海，1918.02)，頁146。

這是胡適在 1918 年時發表的文章中，提及他在民國 3 年之時(1914 年)，曾以〈睡美人〉詩作比喻中國的處境，回溯其當時抱持的創作源由想法。在此段話中，胡適所述的拿破崙睡獅說，幾乎和現代所流行的版本一模一樣，由此可以推論此種拿破崙睡獅說，出現在中國語境的時間約當在清末民初之際，但是究竟出處為何，則尚待進一步的查證研究。但有趣且更重要的是，相較於晚清「睡獅」論中，往往強調「獅子」所代表的潛在威脅力量，如何能夠一朝再起重振聲威；胡適卻以「睡美人」的意象，形容東方的古老文明如何在歷經西方(西風)的挑戰後，方才甦醒並因而發覺早已落後當今時尚，唯有經過一番向外學習新事物的努力革新之後，才又成為比過往更加亮麗的美人。

對於胡適而言，東方睡美人如何透過西化(西市問新制)重新改造自我，是有關中國沈睡之說的真正重要旨趣。從胡適推崇大力學習西方文化的基本立場來看，過往強調中國為具有威脅西方潛力之睡獅的說法，雖然是源自於西方(就胡適在本文中所表明的認知)，卻反而在中國的思想界中，鼓舞一種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甚至仇外的驕傲心態。作為一位具有強烈世界主義的信念者，胡適無意附和這種以國家之間衝突報復為基調的睡獅論。⁴³但他接受以 *sleeping* 形容近代中國，在未受西方挑戰前之處境的說法。相對於以前「睡獅論」中所建構強調的中國，是明顯具有“*masculine power*”的「將醒之睡獅」；胡適以「美人」取代「獅」，強調美人為了挽救其“*feminine beauty*”的努力和革新；同時，胡適視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挑戰，如同童話故事中的武士之吻，都是代表著將「睡美人」從沈睡中救贖的力量。由此觀之，胡適此一詩作，可以說徹底地顛覆了以力為論述核心的睡獅說。其不僅放棄原先睡獅論所立基之黃白種戰，以及中西衝突的國際觀模式，更藉由「英雄救美」的故事架構，詮釋

⁴³ 有關胡適和新文化時期所盛行的世界主義的研究，可參閱桑兵，〈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北京，2003.03)，頁77-99。此外，有關胡適一生中，關於愛國主義和西方文化之間的價值取捨課題的分析討論，可參閱楊貞德，〈胡適愛國主義中「國界」與「是非」的抉擇〉，《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1期(台北，2002.09)，頁407-425。

近代中國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刺激挑戰和影響下，獲得新生的機會。

(二)是人或是獸？

「醒了！這是最好沒有的事，像俾斯麥、威廉一輩子的人，自然提起中國來，便說，這是獅子，他醒了可怕，將來一定有『黃禍』，我們趕快抵禦他。中國人為什麼要自己承認是一個可怕的獅子？我且從根本上來說。『人生』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一個民族生存下去，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一個國家建立起來，是不是要拿『使人怕』做目的？⁴⁴」

「你如果說中國睡了幾百年，我是承認的。說中國現在醒了，我是很希望的。說中國沒有睡以前，是一個獅子，所以醒了之後，也是個獅子，我就不敢附合了。因為人類當野蠻的時代，或者有時學過獅子的辦法，到了開化以後，改變過來，便不能拿他當獅子看待。⁴⁵」

這是英年早逝的朱執信(1885-1920)，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發表於《民國日報》的評論文中，有關風行於當時的「睡獅論」之部分見解。這位在 1905 年，即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的留日知識份子，必然對於清末民初時期有關睡獅的言論相當熟悉。有趣的是，他也認為所謂「睡獅醒了」的相關言論，乃是某些歐洲人，為了壓迫中國而誇大中國力量的策略論述，正如同「黃禍」論的作用一樣。⁴⁶他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出他認為德國首相俾斯麥，是「睡獅」論的確切出處，這和上述在 1904 年，有關留學生的評論文之看法一致。因此就「睡獅論」的源流之外來性質而言，朱執信和胡適，雖然指向不同的西方權威政治人物，但都不認為(或者說沒有意識到)它可能源自於近代中國的曾紀澤和梁啟超的相關論述。

但是，真正令朱執信感到不解的是：「中國人為什麼要自己承認是一個

⁴⁴ 朱執信，〈睡的人醒了〉，原載於《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海)，1919年6月28日-1919年7月3日，今收錄於《朱執信集·上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22。

⁴⁵ 朱執信，〈睡的人醒了〉，《朱執信集·上集》，頁327。

⁴⁶ 朱執信，〈睡的人醒了〉，《朱執信集·上集》，頁322。

可怕的獅子？」朱執信對其所認定之，西方人對於他者(the other)不懷好意的建構形象(中國為獅子般之猛獸)，居然在中國文化論述中大行其道的現象，認為這是社會價值嚴重扭曲的後果。對於朱執信而言，獅子符號在所謂睡獅將醒的論述中，所代表的是一種帶有侵略性質的野蠻力量，是一種使他人畏懼而無法相親愛的疏離力量。他認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基礎，乃是建立在互信互愛互助的基礎上，民族和民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亦復如此。這種親善關係的基礎，是建立在「不要使人怕，要做人，不要做獅子⁴⁷」的邏輯之上。所以獅子符號，所代表的是「軍國主義」、「侵略政策」，而非能夠促進人與人間相處之道的和善力量。「在這個時代，還要說我是獅子，那就同變老虎去吃親哥的公牛哀一樣。好說，也是夢還沒有醒。⁴⁸」

(三)是鼠或是獅？

相對胡適和朱信執，以他們所信奉的國際觀來評擊睡獅說之不當，上海《民國日報》主編葉楚傖，則從中國內政發展的經驗角度，提出他對於睡獅說的質疑。⁴⁹在一篇題為〈外人對華觀察的變遷〉的評論文中，葉楚傖提到：「以前，外人都稱中國做睡獅，獅固然睡了，然醒時必能抖擻精神，來做百獸之長。我們那時，聽得了這一名稱，覺得很不滿意，以為獅是不差的，睡卻未必。現在呢？辛亥革命軍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那時全國歡呼，朝氣十足，真像是醒獅；臨時政府取消，國家的權力，由革命黨手裏移轉到舊官僚，那時像睡獅只欠了個伸，又睡熟了。⁵⁰」

對葉楚傖而言，睡獅說也是源自於外人之口，但睡獅說中真正精華之處，既不是「睡」(他認為當時的中國人並不接受此形容詞)，也不是能夠或是會去威嚇外人的「獅」，而在於獅醒之時(必能抖擻精神，來做百獸之長)，是代表具有

⁴⁷ 朱執信，〈睡的人醒了〉，《朱執信集·上集》，頁329。

⁴⁸ 朱執信，〈睡的人醒了〉，《朱執信集·上集》，頁329。

⁴⁹ 葉楚傖(1887-1946)，早年即參與同盟會，為國民黨要員。他曾嚴厲批評袁世凱稱帝之舉，並反對孫中山的聯共聯俄政策，後來曾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秘書長等職位。

⁵⁰ 葉楚傖，〈外人對華觀察的變遷〉，《民國日報》(上海)，1923年11月6日。

政治自主意識的國民所建立起之國家。中國過去之所以為睡獅，乃是專制體制壓抑下不得不然的結果；因此他所期待的「醒獅」，是在健全的民主體制中，完成真正「主權在民」理想的中國。然而，葉楚傖很悲觀地認為，由於現在依然是舊官僚掌控政治大權的時代，國民早已失志而對政治不聞不問，因此中國已從過往的睡獅演變為更糟糕的睡鼠。

不同於當時流行的「睡獅說」，葉楚傖完全沒有著墨所謂「醒後的中國」，將會成為外國人敬畏的勢力的說法。他對睡獅論深感困惑的課題在於：如果中國歷經革命後，依然不能建立民主國家，那麼中國的本質真的是獅子嗎？如果經過所謂國民革命推翻專制之後，國民卻對政治依然是不聞不問，那麼「睡的真的是獅子嗎？」正由於葉楚傖將「睡獅」，從國際舞台的詮釋脈絡中，拉回到近代中國政治發展史的脈絡上，使得他對所謂「睡獅」具有巨大潛能的臆想，產生根本性的懷疑，進而懷疑被視為百獸之王的獅子符號，是否適用於代表中國的本質。如果按照前述晚清革命文宣中，睡獅說的論述邏輯，不再受專制政府箝制的中國，的確是應該是醒來的獅子了；然而，民國成立後的政局發展，特別是國民對於政治的冷漠態度——「國民呢？以前是概不與聞，現在是無志與聞了。沒有了國民，哪得不獅變為鼠。」——讓葉楚傖重新界定中國的本質乃是人人皆可欺凌的鼠輩之流。

由於葉楚傖關注的課題，是近代中國人本身是否關懷並投入政治改革，因此在他對「睡獅」符號的反思批判思想中，外國人反而成為一個被動因應中國發展的角色。他認為過去外國人儘管稱中國為睡獅，但他們「無論如何，總還是將中國當作國家——就是將來的勁敵或好友；現在，見得是鼠了，不屑與為友，不必認為敵了，於是本著利己性，放手大膽地來要怎樣就怎樣，列強最近對華的態度，大概如此」。⁵¹在時下流行的「睡獅說」，扮演著將要被「醒獅」驚嚇和「教訓」的首要敵人——外國人；在葉楚傖的描繪下，反而不過是因為中國自甘墮落，所以才改變對華態度，乘機佔中國便宜的「被動侵略者」。

⁵¹ 葉楚傖，〈外人對華觀察的變遷〉，《民國日報》（上海），1923年11月6日。

綜而言之，胡適和朱執信對於「睡獅」意涵的批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應了五四新文化期間，崇尚世界主義且貶抑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新思維價值。葉楚傖則以反省近代中國國民自身的政治行為和意識為基礎，重新質疑「獅」作為中國代表符號的適切性。從他們不約而同地針對於，批評獅子作為國家和國族集體力量的象徵符號看來，當時的「睡獅論」已經是被強調「即將／已經甦醒且震驚西方的睡獅(中國)」的詮釋所主導；同時也意味著，在清末民初流行之睡獅說的其他意涵，不論是梁啟超筆下的老大帝國，或是被異族專制政權壓迫的漢族，幾乎已一一地退出歷史舞台。儘管他們都提出新的符號(睡美人、睡的人醒了，睡鼠)，企圖顛覆當時「睡獅」符號，所引導出的對中國特定的詮釋和想像，但是從日後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來，他們反思力量所發揮之力道是極其有限地。時至今日，每當「睡獅」符號被召喚之時，人們所想到的，就是將要令世界震驚的中國新勢力——「將醒之獅」。若非透過歷史研究，睡美人等其他符號和相關批評論述，恐怕早已是在「獅吼」聲中「長眠不起」，而不復見於近代中國國族想像的公共記憶中。

四、結語：睡獅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

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⁵²

1939年7月7日，近代中國知名作家朱自清，在其紀念兩年前中國開始正式投入對日抗戰的文章〈這一天〉，以充滿激情的筆調，描繪一個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展望未來的短文中，朱自清運用了若干源自於晚清，所流行之國族共同體想像符號(東亞病夫、睡獅、散沙)，用以強調中國如何地脫胎換骨，即將從這些舊有負面形象蛻變為「新中國」。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這些國族符號，透過知名作家的召喚，再一次地發揮凝

⁵² 朱自清，〈這一天〉，收入於朱喬森編，《朱自清文集2·散文卷II·生活旅情》(台北：開今文化，1994)，頁209-210。

聚人心的作用。儘管在近代中國的公共意識和論述當中，這些符號幾乎都被視為是「外國人對中國／中國人羞辱的字眼」，但他們儼然已成為近代中國國族主義論述中不可或缺的要角。

本文針對睡獅這個國族符號相關意涵的課題，探索它在各種不同文本和歷史脈絡中的發展演變過程。首先釐清並破除所謂拿破崙和此國族符號誕生之間的可能關係說法，再進一步確認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經過梁啟超的〈動物談〉中，以動物譬喻來論述國族的手法，藉由將「睡」與「獅」兩種負面意涵的結合(睡代表麻木不仁，獅則是老大腐朽的象徵)，從而產生此項具有強烈負面意涵的國族符號。可是反諷的是，此種負面意涵卻在日後眾多引用的論述中高度淡化，它反而被詮釋成為漢族或中國國族之集體潛在力量的象徵符號；它甚至如同另一個國族符號「黃禍」一般，被視為是西方人(或是西方英雄人物)認為中國國族力量不容小覷而有感而發的恭維之詞。然而即使是如此，在近代中國的思想論述中，仍是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例如胡適的睡美人說，對於此盛行的睡獅國族符號的意涵和正當性，提出種種質疑或是再詮釋。

誠如多位研究者指出，國族主義論述的一項特色，在於容易化約複雜的歷史現象，將可能具有多重意義的歷史事件／人物／符號，加以簡化甚至神化，用以符合特定的國族歷史敘事脈絡。⁵³事實上，晚清以降流行的國族符號的曖昧性，並非沒有被人所意識到。近代中國偉大的文化批評者魯迅，早在1933年之時，就已經敏銳地觀察到一些所謂源自西方的中國形象(包括睡獅等動物譬喻)，在中國公共論述中所產生各種光怪陸離的效應：

現在的所謂「黃禍」，我們自己是在指黃河決口了，但三十年之前，並不如此。那時是解作黃色人種將要席捲歐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聽

⁵³ 有關此課題的討論，可參閱Craig Calhoun, "Nationalist Claims to History," in *Craig Calhoun,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 51-65; Peter Burke, "History as Social Memory," in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3-59.

到了這句話，恰如聽得被白人恭維為「睡獅」一樣，得意了好幾年，準備著去做歐洲的主子。不過「黃禍」這故事的來源，卻又和我們所幻想的不同，是出於德皇威廉的。他還畫了一幅圖，是一個羅馬裝束的武士，在抵禦著由東方西來的一個人，但那人並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國人實在是空歡喜。所以我們一面在做「黃禍」的夢，而有一個人在德國治下的青島所見的現實，卻是一個苦孩子弄髒了電柱，就被白色巡捕捉著腳，像中國人的對付鴨子一樣，倒提而去了。……德皇的所謂「黃禍」，我們現在是不再夢見了，連「睡獅」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見。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我不知道我們自己覺得現在好像是什麼了？

我們似乎不再想，也尋不出什麼「象徵」來，我們正在看海京伯的猛獸戲，賞鑒獅虎吃牛肉，聽說每天要吃一隻牛。我們佩服國聯的制裁日本，我們也看不起國聯的不能制裁日本；我們贊成軍縮的「保護和平」，我們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軍縮；我們怕別國要以中國作戰場，我們也憎惡非戰大會。我們似乎依然是睡獅。

「黃禍」可以一轉而為「福」，醒了的獅子也會作戲的。當歐洲大戰時，我們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島被佔了，我們有可以倒提的孩子。但倘說，二十世紀的舞台上沒有我們的份，是不合理。⁵⁴

從魯迅的疑惑：「我不知道我們自己覺得現在好像是什麼了？」（黃禍？睡

⁵⁴ 魯迅，〈黃禍〉，收入魯迅著，張健校訂，《魯迅全集》，第5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43-344。魯迅所言：「我們似乎依然是睡獅」，反應出他認為在當時東西強權所主導的國際局勢下，中國仍然是陷於無所適從的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的狀態中；此外魯迅在此處應是挪用（孫中山所謂appropriate）「黃禍畢竟可以變成黃福」之說，而賦予不同意涵。孫中山在1904年的對華僑演講〈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中，強調一旦中國覺醒並採用西方方式和思維，不但不會威脅世界，反而會對全世界有利，因為中國將如同一個富裕聰明的鄰居，會是一個最愛好和平的民族，因此會對世界的繁榮發展有正面的貢獻，相關資料參閱呂浦等編譯，《「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369。魯迅顯然用反諷的表述，顛覆孫中山的樂觀看法。

獅？豬？羊？），以及他對現實和理念之間巨大落差的描述，我們不難意會到，在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的曲折和複雜之建構過程當中，所牽涉到的思想和情感認同上的種種矛盾與糾結。借鏡於魯迅對這些國族符號提出的洞見，本研究嘗試歷史化(historicize)「睡獅」符號，探究其產生之歷史背景的可能動向，並且分析它在不同的論述中的意涵，以及它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當中，所引發的各種不同回應。希望能超越本質論式(essentialist)的文化現象分析，來理解這種百年來，錯綜複雜的東西跨文化和跨語境的互動過程，以便令我們能夠更進一步理解分析，在中西文化交會的過程之中，近代中國知識份子，面對強勢西方文化價值的衝擊時，所持有的愛憎交雜之複雜思緒。

徵引書目

(一) 史料

1. 中日文部分

1. 《太陽》，第6卷第8期(東京，1900.08)。
2. 《民國日報》(上海)，1923年11月6日。
3. 《新青年》，第4卷2期(上海，1918.02)。
4. 朱執信，《朱執信集·上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5. 呂浦等編譯，《“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6. 沈雲龍主編，《清議報全編》，第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7. 沈雲龍主編，《清議報全編》，第4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8. 沈雲龍主編，《清議報全編》，第18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9. 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台北：經世書局，1981。
10. 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
11. 曾紀澤，《曾紀澤遺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
12. 廣文書局編譯所，《外交報彙編》，第4冊，台北：廣文書局，1964。
13. 魯迅著，張健校訂，《魯迅全集》，第5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4. 羅家倫主編，《江蘇》，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發行，1983。
15. 羅家倫主編，《國民報彙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發行，1983。

2. 西文部分

1.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17 May 1854, p. 8.
2. *The Times* (London), 19 January 1858, pg. 8; Issue 22894; col C.
3. “The Marquis Tseng's Farewell To Europe.” *The Times* (London), 29 December 1886, pg. 5; Issue 31955; col A.
4. “Death Of The Marquis Tseng.” *The Times* (London), 14 April 1890, pg. 8; Issue 32985; col A.
5. *The Times* (London), 12 August 1936, pg. 15; Issue 47451; col C.
6. “Let China Sleep. When She Awakens, the World Will be Sorry,” *Times* (New York), 1958, cover.

(二)專書

1.中文部分

1. 朱喬森編，《朱自清文集2·散文卷II·生活旅情》，台北：開今文化，1994。
2. 宋強，張藏藏等，《中國可以說不》，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
3. 宋強，張藏藏等，《中國還是能說不》，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
4.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5. 張學禮，《中國何以說不——猛醒的睡獅》，北京：華齡出版社，1996。
6. 許政雄，《清末民權思想的發展與歧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7. 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 費約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店，2005。
9. 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10. 龍應台、朱維鈺編著，《未完成的革命：戊戌百年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11. 蘇曉康、王魯湘，《河殤》，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88。

2.西文部分

1. Bernstein, Richard & Ross Munro.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Knopf, 1997.
2. Burke, Peter.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Calhoun, Craig.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4.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6. Peyrefitte, Alain, trans. Webb, Graham. *The Chinese: Portrait of a Peopl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7.
7. Wasserstrom, Jeffrey N. *Excursions in Sinology*, Hong Kong: Shangwu Press, 2002.

(三)論文

1.中文部分

1.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28期(台北，1997.12)，頁1-77。

2. 桑兵，〈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近代史研究》，第2期(北京，2003.03)，頁77-99。
3. 陳建華，〈拿破崙與晚清「小說界革命」：從《泰西新史攬要》到《泰西歷史演義》〉，《漢學研究》，第23卷第2期(台北，2005.12)，頁321-354。
4. 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天津，2006.07)，頁29-36。
5. 黃賢強，〈動物化文圖與清末反教排外運動〉，《清華學報》，第28卷第4期(新竹，1998.12)，頁461-485。
6. 楊貞德，〈胡適愛國主義中「國界」與「是非」的抉擇〉，《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1期(台北，2002.09)，頁407-425。
7. 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台北，2005.11)，頁1-44。
8. 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台北，2006.11)，頁65-108。

2. 西文部分

1. Dirlik, Ari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Dec. 1996), pp. 96-118.
2. Elman, Benjamin A. "Naval Warfare and the Refraction of Qing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 Reforms into Failure," *Modern Asian Studies*, 38(Fall 2003), pp. 283-326.
3. Fitzgerald, John. "'Lands of the East Awake!': Christian Motifs in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m," 收入於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361-410。
4. Goebel, Rolf J. "China as an Embalmed Mummy: Herder's Orientalist Poetics," *South Atlantic Review*, 60:1(Jan. 1995), pp. 111-129.

The Sleeping Lion is about to Awake?: The Images of “Sleep” and “Lion”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Yang, Jui-s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Sleeping Lion” image has figured prominently in the modern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study aims to trace the birth of this image, and to explore the trajectory of its changing meaning in different textu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First, I try to clarify and dismiss the legend that this image was coined by Bonaparte Napoleon to praise China’s potential power. Secondly, I argue that Marquis Tseng’s idea that China should be awake after long sleep was further modified and appropriated by Liang Ch’i-ch’ao in his formulation of the “Sleeping Lion” image. Initially, Liang intended to criticize China as a inactive and bulky nation in terms of the “Sleeping Lion” symbol. However, this negative meaning of this symbol was soon to be downplayed in the numerous discours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stead, “Sleeping Lion” image was mainly interpreted as a positive symbol representing the great potential power of the Han people or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Yellow Peril” image, it was even regarded by many Chinese elites as a compliment on China by the Western Powers. In spite of this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different “voices,” which either challenge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is image in representing China, or proposed alternative images, such as “Sleeping Beauty” coined by Hu Shih. By means of analyzing these “counter-discourses,” I look into the multiple meanings, as well as ambiguities of the “Sleeping Lion” metaphor, and therefore reflect upon the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stead of adopting an essentialist approach, I try to historicize this complex cross-lingual/cultural phenomenon in order to illuminate more clearly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tradictory and complicated feeling toward the dominant western cultures.

Keywords: Sleeping Lion, Marquis Tseng, Liang Ch'i-ch'ao, On Animals, Hu Shih

